

焕新“工业风”，新中国“工人第一村”重光

沈阳工人村曾是我国最大的产业工人聚居区。这个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工人第一村”，见证了那个火红年代，也目睹了20世纪90年代后一度步入低谷的落寞。随着被誉为“东方鲁尔”的沈阳市铁西区近些年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工业遗存，一批老厂房、老建筑、老地标在合理利用中获得新生，这个曾经的老工业城区增强了文化活力，提升了文化魅力，也让一度沉寂的工人村看到了奋起的希望。



本报记者王炳坤、武江民

承载时光：难忘的集体荣耀

工人村不是村，却是工人作家张瑞永远的“故乡”。1959年出生，从牙牙学语到娶妻生子，张瑞人生大半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2021年，搬离工人村20余年后，他出版新书《圣地工人村》，以自己人生的刻度记录下工人村的起伏。近日，张瑞带记者又一次回到了工人村。沈阳市铁西区重工南街以东，36栋苏式斜顶的红砖小楼呈围合形态，院内绿草如茵，嘉树葱郁。红楼之外，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之间，工人村更显静谧。行客匆匆，很少有人停下来了解这里曾经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之初，沈阳市铁西区集中了500多家国有企业，是全国工业化最高的城区之一。1952年，沈阳市在这里投资1200万元，集中建设产业工人住宅区，到1957年形成占地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的5个苏式风格建筑群。沈阳市将这里命名为工人村，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等44家大中型企业在这里设立了家属宿舍。站在老楼前，木质窗框，楼道印花玻璃早已

图1：搬迁后的工人新村。
图2：经厂房改造后的1905文化创意园。
图3：经锅炉房改造后的沈阳市66号艺术仓。
图4：20世纪50年代的沈阳工人村。
图5：20世纪80年代的沈阳工人村电影院。

斑驳，张瑞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当冬日升起第一缕阳光，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工人村响起，几时的张瑞趴在窗户上向外望，那些身穿厂服，裹着红围巾、羊绒帽子的人们，呵着热气，在雪地里留下一串串车印。当时，铁西区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张瑞回忆，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大家都不计报酬，不辞辛

苦，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想报答新生的共和国，工厂里的生产纪录月月被刷新，年年创新高。工人村建设规模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房屋设备，商店、电影院、照相馆等服务设施也一应俱全。张瑞说，住进工人村既代表着一种身份，也承载起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一次，张瑞的舅舅来家里做客，不懂如

何冲马桶，急忙喊来张瑞。张瑞站在厕所门口，轻轻一拉，下水管道响起轰隆的过水声，蹲在原地的舅舅突然被吓到，一跃而起，仓皇中夺门而出……张瑞说，当时在沈阳，即便住在小洋楼，拥有室内冲水马桶的人家也很少。每当同学来家里做客，总要在厕所里“享受”一番。拥有一个住在工人村的亲戚朋友，在那时值得被

人们反复提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阳工人村作为改善工人居住条件的样板而闻名全国，常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地代表和外国访问团前来参观。工人村记录一代人的荣光，也承载了许多乡愁。工人村里大多一户人家住在一室，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每至饭点，当家女主人们你拎着锅铲，我剁着蔬菜，楼上楼下锅碗瓢盆叮当响，烧起饭来整楼飘香。张瑞家里人口多，客人来了大通铺挤不下，奶奶就会把哥哥姐姐送到邻居家里睡几晚。每当挖了野菜，淘到海鲜，奶奶也总想着给左邻右舍送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在当年的工人村得到最好诠释。“谁家晾晒在户外的衣服赶上刮风下雨或晚上忘收了，根本不用担心，准会有人替你收回来。”张瑞在《圣地工人村》一书中回忆道，那时在工人村很少有人丢失东西，一旦让左邻右舍知道谁家出了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这家人在楼里就抬不起头了。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沈阳城区高楼拔地而起，工人村也不再是当年的“优等生”。工人村二代、三代们的出生，让一套套30多平方米的房间局促不堪，随之而来的下岗潮也让这里逐渐落寞下来。2000年，经历工厂停产、工作调转的张瑞最终决定下海，在沈阳市繁华的三经街报社附近租房创业。在老邻居们的再见声中，张瑞如同离家的游子，坐在搬家车上彻底离开了“故乡”。

文化寻根：在工业遗存中触摸城市历史

2015年，王安在早已闲置废弃的沈阳飞轮厂老厂房前踱步。在别人眼中，这里红砖残、窗户破，与周围的繁华格格不入。但从商十余年的王安眼中，这里是事业的新起点。彼时，随着工业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沈阳市铁西区一些工业遗产迎来新的契机。原沈阳铸造厂被改造成中国工业展览馆，约30米高的铸造车间被保留下来，巨大的冲天炉被架在半空中，保持着“一倾如注”的姿态，浓郁的工业风让人震撼。2012年5月开馆后，这里就以1.3万余件的丰富藏品，真实再现工业生产的原始场景，深刻记录劳模精神的厚重历史，受到人们的青睐，平时接待的参观者不断。（下转16版）

“重走立波先生路”：跨越时空的文学接力

本报记者张格、袁汝婷

80年前的5月，对于时年34岁的作家周立波来说，创作的转折点即将来临。“在过去，我到过前方，也到过乡下，但是没有写出好作品，因为我在那里是‘做客’，客居的时间又很短。”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周立波找到了方向。他积极响应文艺工作者上前线、下乡的号召，从现实农村生活中汲取养料，开创了乡土文学新主题和新风格，与同时期乡土文学作家赵树理并称“南周北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周立波的故乡湖南益阳清溪村——这里也是他的小说《山乡巨变》创作原型地，寻访他的足迹。

返乡，记录山乡巨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曾认真展开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那一场座谈会，成为周立波人生的重要分水岭。自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的文学品格，贯穿他的创作生涯。他随军南征、投身土地改革、走进火热的生活，创作出《暴风骤雨》《铁水奔流》等经典作品。此后，周立波决定重返家乡。1955年，他携家人从北京迁回益阳，建立起长期生活和创作的基地。在家乡，他深入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

描绘新中国农村深刻变革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由此问世。原益阳团县委副书记彭玉霞是《山乡巨变》中邓秀梅的原型。回忆起周立波，今年90岁的她说：“当时我们开会，斯文低调的他每次都坐在角落，不说话，就默默观察和做记录。”彭玉霞说，第一次读《山乡巨变》时她就发现，那些跃然纸上的人物与情节，都脱胎于真实生活。小说中，周立波如是描绘一个打扑克场景：“摸摸鼻子，就是要梅花，眨眨眼睛，是要黑桃。”“连忙伸手要把梅花六收回，口里说道：‘我出错了牌’。‘你敢拿回去！落地生根，放下不放下？’……”灵动的描写源自周立波的“观战”经验：每次大家开会休息打牌时，他就在旁边“痴看”。优秀的文艺创作者，总是对生活充满好奇。新华社湖南分社原记者胡坚撰文回忆，周立波会和小孩子一起兴致勃勃地追着看新娘子坐花轿等民俗。更多时候，他会仔细观察农民劳作，看他们挖土、踩水车、唱山歌、打谷，有时看得入迷，连饭都忘记吃。“塑造人物时，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周立波曾说。

扎根，永葆赤子之心

“红桃花色（脸色红润）”“打伙求财（共同致富）”“梭梭里里（干干净净）”……如今，清溪村里，一面面“方言文化墙”妙趣盎然，引人驻足。《山乡巨变》中，周立波就大量运用了这样的方言俗语，读来真实亲切。步入周立波故居的卧室，阳光透过三扇玻璃

窗洒在书桌上。老乡们回忆，重返家乡时，周立波谢绝了修建新屋的提议，而是在老屋的木板房里工作。房间低矮、光线不足，他因陋就简，在书桌前的板壁上凿了三扇窗“借光”。20世纪50年代，周立波是一场变革的旁观者、记录者，更是参与者、体验者。他从不以“作家”“客人”身份自居，除了伏案读书写作，尽可能参加生产劳动。农忙时节，他几乎每日都劳动半天，和农民一起下田。一开始，挑三四十斤的担子，清瘦的周立波就觉得腿软。一段时间后，挑七八十斤他都能健步如飞。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更他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心连心的办法。一次，有记者到村里拜访周立波。交谈间，窗外有人喊：“有头水牛跌进了水沟！”周立波闻声，丢下客人就往外跑，看到一头大水牛四脚朝天在水沟里挣扎。老农告诉他，牛的眼睛朝天，容易炸胆而亡。周立波连忙和社员一起挖宽水沟，用树枝帮牛使劲，直到牛翻过身站了起来，才松了口气。还有一回，周立波劳动时不小心摔倒在水田，弄了一身湿泥巴。在场的乡亲劝他，都成了“泥牛”就别下田了。他却风趣地说：“要真像一头牛才好，‘俯首甘为孺子牛’嘛。”胡坚曾记录下这样的故事：周立波在翻粪时，发现田里的肥料不平衡，便组织十多人砍青积肥，改良了“落后田”。“立波同志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胡坚回忆道。当时，周立波还兼任了清溪村所属桃花仑乡的党委副书记。乡亲们不叫“周书记”，而是直接唤他“老周”。老周和村民十分亲热，大

家都喜欢拉着他到家里闲聊，小孩子看到他，会直接往他身上爬。这样真挚热情的交往中，他收集了不少俗语方言，产生了创作灵感，积累了丰富素材。如今，清溪村的清溪广场上，有一座长29.98米、高9.98米的“喜庆丰收”群雕，由13位人物组成。面带微笑的周立波坐在中间，抱着一个孩童，村民们环在他身边。故居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片梨园。20世纪60年代，为改变家乡贫穷面貌，周立波拿出稿费 and 奖金，设法买来梨树苗、蜜橘树苗，请来农技员做指导。栽树时，他和村里的干部群众一起挖坑、培土、浇水。果树成林后，增加了集体收入。如今，漫步在清溪村里，仍能寻见周立波留下的足迹。村里的老人们说，他一直心系家乡人民，多年坚持寄回稿费资助村里的孤寡老人，还多次自掏腰包支援建设林场、畜牧场、文化室等，却从不求回报。

回望，价值超越时空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布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面向全社会征稿，邀请全国广大作家和文学写作者共同书写新山乡，以原创长篇小说形式讲述山乡故事，不到一个月即收稿300余篇，近6000万字。周立波曾说：“文学的园土是在人民生活里。作家必须长期扎根在生活的肥土里边，才

会有出息。”彼时，不仅是周立波，还有柳青、赵树理等一大批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高度认同和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跨越半个多世纪，他们的文学道路，给今天的文艺创作带来怎样的启示？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周立波评传》作者胡光凡说，周立波的文学道路和文学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毕生扎根人民中，为人民写作。“周立波的小说不只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本身，而且生动揭示了农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和动力，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的心路历程和伟大力量。”胡光凡说，这启示当今文艺工作者，要关注、关心、关爱人民群众，深入生活，与时代同行。如今，清溪村正在新山乡巨变中演绎新的故事。益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铁华介绍，清溪村正在大力推进“当代作家书屋”等文化项目建设，“我们希望吸引更多文艺人士来村里创作，共同续写‘山乡巨变’的新时代篇章。”今年，长篇报告文学《新山乡巨变》出版，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接力——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余艳走进清溪村，以乡村振兴为坐标，再现了这个深具文学内涵的“新农村”。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她从清溪村出发，踏访七个县市区，在周立波当年走过的村镇与农民交朋友、话家常、同吃一锅饭，采访了208位典型人物。“这是一部以时代为导向，以人民为主角的作品。”余艳说，《新山乡巨变》的采访创作，其实就是“重走立波先生路”。